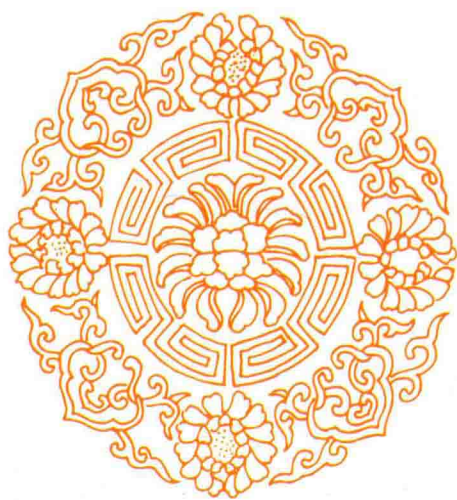


# 跨界与融合

佛教与民族文化的云南叙事

郑筱筠/著



# 跨界与融合

佛教与民族文化的云南叙事

郑筱筠/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界与融合: 佛教与民族文化的云南叙事 / 郑筱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161 - 6796 - 0

I. ①跨… II. ①郑… III. ①佛教—关系—少数民族—民族文化—  
研究—云南省 IV. ①B949.2②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0633 号

出版人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75  
插页 2  
字数 358 千字  
定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云南现有 26 个民族，其中 25 个是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云南又是宗教类型较多、呈立体交叉分布的省份。云南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 26 个民族都有宗教信仰。宗教在云南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各种宗教交叉存在。一方面由于各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原生性宗教，使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原生性宗教的因素成为云南宗教的信仰底色，具有鲜明的内生性特征；另一方面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有 16 个民族跨境而居，为世界宗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国际性、民族性以及地域性等特征。与此同时，云南各个民族由于受到来自传播路线的外来宗教的影响，形成各大宗教并存、和谐相处的多元、多层次的特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大省，也是一个活态的宗教文化博物馆。对之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就佛教而言，佛教传入云南的历史源远流长，且经由不同路线和地点传入了不同的佛教流派。就云南境内的佛教支系而言，有梵文—汉文经典系（汉传佛教）、巴利语经典系（南传上座部佛教）、藏语经典系（藏传佛教）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内部又分不同的宗派。在长期的历史传播过程中，它们与云南原有的民族文化冲突、斗争、融合，最终沉淀下来，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对于信仰佛教的信徒来说，生活在相对静止的平面的部落社会中，成为佛教徒是终其一生的历程和必然选择。这基本上是云南佛教徒信仰的历史共性。这些历史特征都体现在信仰佛教的民族文化之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佛教与民族文化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云南民族文化体系的建构。但我们可以说，正是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多元、

多层次的融合，立体地全方位浇灌了红土高原，成就了七彩云南。因此，斟酌再三，笔者以“跨界与融合”来形容佛教与云南民族文化之关系。民族文化形成了云南文化结构体系的一个特殊底色，而宗教文化则是在不同时段系统中的网格，与民族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形成跨界与融合这样的内生性关系特点，完成佛教与民族文化在云南的实践经验。

在实践经验的歷史表达过程中，作为重要的历史表达主体，汉族与白族、傣族、纳西族、德昂族、景颇族、佤族等少数民族一起共同建构起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

就宗教学角度而言，云南的佛教文化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特点。就云南境内的佛教而言，有阿叱力教、汉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这几个佛教派别原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但它们却同时集中于云南境内，并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云南民族文化体系的建构。这一现象在国内乃至国际都是绝无仅有的。对之进行研究，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就历史学角度而言，佛教对云南许多民族的历史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以阿叱力教而言，它是印度密宗、藏密、汉密乃至大乘显宗共同作用的白族化产物。阿叱力教的流行，与白族的形成和白族文化的兴起，以及南诏大理文化的繁盛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阿叱力教成为国教，对南诏国内多元部族的一体化进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白族正是这个一体化进程的最终产物。与此相似，南传上座部佛教对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等，藏传佛教对纳西族、藏族、普米族、摩梭人等，汉传佛教对白、彝等民族文化体系的建构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不研究佛教，无法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各民族的文化精神；不研究佛教与云南民族文学之关系，则无法深刻认识云南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色。

就民族文学角度而言，26个民族居住于云南这块红土地，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学成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分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的文化。而文学作为民族历史的忠实载体，以各种形式传承着先民及其子孙们创造的历史文明。研究民族文学，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研究云南民族文学，可以看出民族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而形成以微观研究反映宏观的特点。佛教对云南民族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上几方面，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单向的。云南民族文学对佛教的融摄，既是佛教被云南各族人民认可的一种表现，又是云

南各族人民胸怀博大、兼容并蓄的一种体现。而且正是由于云南民族文学对佛教义理、观念的接纳，对佛典人物及其故事类型之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在云南的发展和传播。总之，佛教与云南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互动的、相互影响的。

如果仔细研究佛教与民族文学的关系的话，即可看出佛教与云南民族文学之关系可通过佛教对民族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之设计，故事母题之影响的及文学观念的作用等方面表现出来。对此，正如云南大学著名学者张文勋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常说的云南民族文学，就广义而言，是指云南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学，包括民间口头文学和各民族作家用民族文字或汉文字所创作的书面文学。但是，在漫长的云南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民间口头流传的文学是主要的形式，只有极少数的民族，如傣族、纳西族、彝族等，留下一些用民族文字记载的神话传说或诗歌，但这些作品大多数也是人民口头创作。当然，现在我们研究云南民族文学所依据的资料，基本上都是翻译成汉字的资料，但就其源流而言，大多数也来自于自己民族民间文学。因此，佛教对云南民族文学的影响，也较多地表现在民间文学中。但是，要从众多的民族民间文学中，梳理出受佛教影响的来龙去脉，既须要查阅大量佛学经典和古文献资料，又需要对民族民间文学作深入调查研究。”“云南民族文学，尤其是民族民间文学，它本身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有文化、历史、宗教、民族等等学科的综合价值，所以对它的研究，也就需要以多学科的视角去考察。”对此，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允吉教授则用骈体文形容：“坤舆所钟，在云之南，景淑气清，水澄冈翠。辖区地势悬殊，形胜秀特，高岫则薄雾披纱，平坝则繁花似锦。节序谐和，照众栽于沃野；风操淳朴，聚各族于旷原。祖辈相承，织耕互补，创辟家园，兴营货殖。期岁治功，用舍非遵一例；黎民结习，奉持示现多元。然率礼仪恳至，歌舞杂陈，敬崇远客，贵稟艺能。其趾衔接蕃、桂，雅为边陆邮路；毗邻缅、印，号称亚陆锁环。古昔西洱，值当冲要。由此指趣掸邦，潜通天竺；祖溯由雅，迄抵逻些。厥途烦剧，跋涉维艰。怪石嶙峋，丛林窈杳，惟鸟道之仅存，叹窄桥之险绝。商旅驮帮，含饥忍劳；旄牛香象，叩塞款关。是以蜀中邛竹丝麻，市诸身毒；域外琉璃宝饰，赉及震旦。交播华梵文明，佛法时充主体，纷纭派裔，络绎来滇。曰上座部，曰曹溪禅，曰阿叱力，曰怛特罗。源流既别，悉皆茂畅枝条；显密攸分，威自具呈轨辙。第言文学，表里宗教，方圆嗜好，物语是

耽。略如金翅劈波，海龙遭食；观音负石，罗刹见驱。动辄采撷佛典，敷衍奇闻，固屡听而无厌，虽详熟而长新。又谓天人端严，王子甘堕爱河；奸匿败亡，情侣终成眷属。夫史诗《召树屯》，亦移植《本生经》，意浮屠所触染，何纵广若乃尔？”两位先生对佛教与云南民族文学的关系之精辟见解见于笔者在2001年出版的《佛教与云南民族文学》一书之序言。由于该书出版时间日久，在市场上早已买不到这本书，故再版此书以飨读者。因此，本书上编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对笔者在2001年出版的《佛教与云南民族文学》一书的再版。知识的传播是需要正能量的，它既要求传播正能量的知识，同时更要求传播途径是合理合法的。因此，为了正本清源，进一步推动学术交流机制的良性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知识产权，促进学术研究，而将之再版。

此外，南传上座部佛教自东南亚传入我国云南地区后，在充满冲突、对立、适应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体系，有着不同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乃至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方性”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体制的改变，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南传佛教在佛教信仰区域的空间分布、传播途径、信仰意识的传承、佛教的政治作用、佛教寺院经济以及僧团建设、寺院教育等方面开始出现了不同于过去的一些变化，形成了新的特点，出现了新的现象。对之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南传佛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特征，它一方面积极调整自己体系的社会适应性，突破自身理论体系的限制，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活动，创办面向社会大众的禅修中心，积极拓展适应社会发展的寺院经济模式，加强与国内外各界的交流和沟通，在全球化的思潮中实行自我价值，不断完善自己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回归传统，加固内部体系的稳定，突出自己的独特性，加强各级佛学院的建设，培养僧才，同时又注重内观禅修系统的完善，强化僧团布萨羯磨制度，强调建设属于僧团内部的禅修中心。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南传佛教在全球化的思潮中，既保守，又开放，以极强的兼容性来积极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面向现实、面向人生，由此而出现了世俗化、本色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为此，本书的下编专门聚焦南传佛教，以南传佛教与社会管理体系、

南传佛教的寺院经济管理模式、南传佛教的生态文明、南传佛教的佛塔艺术、南传佛教与发展战略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南传佛教与民族社会、南传佛教与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对社会视域和文化视域下的南传佛教进行审视，提出应该前瞻性地转变观念，重视南传佛教的研究，重视南传佛教的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以此为文化交流平台，以民族文化与佛教的跨界和融合状态来实践世界文明的互鉴互信、互利互通。

是为序。



# 目 录

序言 .....	(1)
----------	-----

## 上 编 佛 教 文 学 民 族 文 化

第一章 佛教与云南龙文化 .....	(3)
第一节 佛教与白族龙文化 .....	(3)
第二节 佛教与傣族龙文化 .....	(15)
第三节 佛教与纳西族龙文化 .....	(37)
第四节 佛教与汉、白族龙文化及其影响异同比较 .....	(64)
第二章 佛教与云南观音形象研究 .....	(81)
第一节 白族观音形象 .....	(81)
第二节 观音信仰原因考 .....	(121)
第三节 观音净瓶、杨枝形象与中印拜水习俗 .....	(129)
第三章 佛教与傣族民间故事 .....	(139)
第一节 佛教与傣族《召树屯》故事渊源 .....	(139)
第二节 佛教与傣族《召树屯》故事不同版本之关系 .....	(149)
第三节 佛教与傣族《兰嘎西贺》故事 .....	(156)
第四章 佛教与白族本主崇拜及其传说分析 .....	(200)
第一节 佛教与白族本主观念 .....	(200)

第二节 佛教与白族本主神系 .....	(212)
余论 .....	(224)

## 下编 南传佛教 社会 民族文化

第五章 社会视域下的南传佛教 .....	(229)
第一节 南传佛教的社会管理体系 .....	(229)
第二节 南传佛教的寺院经济管理体系 .....	(239)
第三节 南传佛教的生态文明建设 .....	(251)
第六章 文化场域下的南传佛教 .....	(263)
第一节 南传佛教的佛塔艺术 .....	(263)
第二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南传佛教 .....	(278)
第三节 南传佛教与文化发展战略 .....	(289)
后记 .....	(319)

上编  
佛教 文学 民族文化



## 第一章

# 佛教与云南龙文化

## 第一节 佛教与白族龙文化

在高度发达的白族文化体系中，白族龙文化作为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始终贯穿白族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它以当事人和见证人的双重身份接受和目睹着白族文化的形成和完善。在它身上体现着白族文化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和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特征。对之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和了解白族文化的形成和完善过程及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就白族龙文化现象而言，其组成因素中既有反映白族先民原始宗教意识的原生态型龙文化，又有源于本民族土壤却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次生态型龙文化，而且还有本来产生于异质文化体系却为白族文化融摄、改造的复合型龙文化。在白族龙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汉族的龙文化、印度、藏传、大乘显密二宗的龙文化等外来文化对其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其形成过程而言，远古时期的诸夏部族龙文化及三国时期汉民族龙文化对白族龙文化的影响结果基本上导致了白族龙文化的原生型诞生，而初唐后，印度密教、汉传显密二宗及藏传佛教对其的影响，便是形成了次生态型和复合型龙文化，其中尤以佛教对白族龙文化的影响至为关键且巨大。笔者拟以佛教对白族龙文化的影响为切入点，以期探讨佛教对白族文化体系之构成所产生的重大作用。

白族龙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白族先民——氏羌族群就已在拜龙习俗，加之受到诸夏族群的龙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较强的拜龙意识和崇龙思想。白族中存在的文身习俗即为拜龙思想的历史见证。据调查，直至近代，大理白族中的段、王、张、杨、李、赵、何等姓氏均有文身习俗。剑川、兰坪、云龙的白族无论男女都喜穿羊皮衣，羊尾巴保留得

完好无损。<sup>①</sup> 白族文身历史悠久，史籍多有记载，《南诏野史》中，《南诏历代条》云“哀牢山下，有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弟兄娶之，立为十姓，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皆刻画其身，象龙文，于衣后著尾。”<sup>②</sup> 此十姓皆为洱海区域白蛮大姓。另据杨正权先生分析，《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记“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的“种人”不惟指哀牢夷，亦指僂人。<sup>③</sup> 此僂人即为白族先民的来源之一。自称九隆之后，并文身以避龙虫之害或求龙蛇庇护，可从广泛流行于云南的《九隆神话》故事内逐窥见一斑。《九隆神话》实质上是感生（贞洁受孕）型民族起源神话与民族始祖神话的融合，并已熏染上了王权色彩，积淀着人类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sup>④</sup> 我国《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均详细记载九隆神话故事，另外，该书还记录了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南中，为夷制图谱事：“（诸葛亮）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安邨；又画牵羊、负酒、斋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诸葛亮所作图谱着重强调了龙与夷之始祖关系，这既是对《九隆神话》故事历史积淀层和族源起源的肯定，又反映出汉文化中龙作为灵物崇拜阶段的神龙意识向少数民族龙文化开始有意识地渗透。仔细分析《九隆神话》内容，可看出九隆神话产生的最初阶段，乃是原始的感生神话，是沙壹“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履姆”或“吞卵”之类的故事，它反映了神话产生的社会背景，即以采集经济为物质基础的母系氏族社会，更重要的是它着重强调了水与始祖之密切关系。而事实上，正是由于水的联结作用，感生型民族起源故事才得以与龙神话相融。可以说，从《九隆神话》开始，逐渐演变、产生的各种龙文化中，其最原初、最深层的历史积淀层内涵正是崇水意识。正是由于崇水意识的深层积淀，白族龙文化才得以生存、发展。

如果说流行于大理地区的《九隆神话》尚属于未受到佛教影响的早

① 田怀清：《白族文身趣谈》，《民族文化》（云南）1986年第5期第54页。

② 杨正权：《龙与西南古代氏羌系统民族》，《思想战线》1995年第5期。

③ 同上。

④ 张福三主编：《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赵楷《九隆神话探源》，见《云南少数民族论集》第一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黄惠焜、傅光宇等先生的论著中均涉及此。

期龙文化现象的话，那同属于这一时期的流行于鹤庆地区的龙与人类始祖的创世神话则更直接地强调了龙的始祖性特点及水的至高无上性意识。在鹤庆地区流行的《劳谷与劳泰》<sup>①</sup>就是这样一则关于龙的神话故事：

远古时期，世上没有人类和万物。天地连在一起，中间夹着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滚烫的海水把天冲开一个大洞。天洞里冒出一大一小两个太阳……两个太阳在天上越撞越猛，小太阳被撞落到大海，大海掀起巨浪，把天穹高高顶起，将地往下冲凹，于是天地就此分开小太阳落进大海后，把海水煮沸了，惊醒了深睡的大金龙。大金龙一口就把火红的太阳吞进了肚里，太阳在金龙的腹中猛烧，龙受不了，一甩头，撞到螺峰山上，使在喉咙中的太阳变成了一个肉团，从龙腮中迸出炸开。炸开的肉团，又裂变成无数肉片、肉丝、肉粉到处乱飞，飞到天上的变成了云朵；悬在空中的变成了鸟雀；落在山岭上的变成了树木花草；落在山麓的变成了走兽飞禽……那撞不碎的肉核核，落地后变成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那第一个出现的女人叫“劳泰”第一个出现的男人叫“劳谷”。<sup>②</sup>从此世上有了人类和万物。劳泰和劳谷结成了夫妻……

在这则传说中，大金龙可以作为创世主存在，其地位远远高于人类创世祖劳泰和劳谷夫妻。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金龙与水、大金龙与人类的关系显然已作为集体无意识原型沉淀于早期白族龙文化现象中。

强调龙与水的关系贯穿着白族龙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究其原因，盖龙神之形成与水的关系密不可分。早在渔猎时代，人们天天与水打交道，逐渐意识到水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基于对自然界的原始整合意识，人们产生了崇水意识，并进而将之具象化为生活于水中的各种动物。后来随着氏族部落集团的不断兼并，龙神作为混合了各氏族部落图腾的最高神出现，进一步起到了凝聚作用，保证各部落风调雨顺、生活安泰，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职能便是司水，主降雨。水作为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因素成为龙神崇拜的最深层次而又最为核心的历史积淀层，并伴随着龙神经历了原始

<sup>①</sup> 《白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sup>②</sup> 劳泰，白语，意为始祖母；劳谷，白语，意为始祖父。

宗教的各个形态以及人为宗教的各个发展阶段，始终不曾动摇和变异。这也是它后来能为各不同部落、各不同族群、各不同历史时段接受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白族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言，龙神的司水意识正是白族龙文化的核心，也是其接受诸夏龙文化、汉族龙文化、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影响的重要契机和出发点。

早在初唐时期佛教传入大理之前，洱海区域分布着众多部族，其中尤以被称为“白蛮”和“乌蛮”的两大部落群体为主。这两大部落群体是由创造了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的土著族群“昆明之属”分化出来的。它们在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南诏国建立，基本统治洱海区域时，构成了南诏的主体居民，亦即大理白族的主要族源。“乌蛮”和“白蛮”作为出自“昆明之属”的同一部落群体的两大族群，它们都继承了“昆明之属”的原始宗教信仰。查诸史籍，昆明人从汉代开始就信仰巫教，巫师成为其与神沟通的神圣媒介。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其俗徽鬼，好诅盟，投石结草营常以盟诅“《通典》亦载昆明人俗好巫鬼、禁忌。‘昆明之属’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有小鬼主”这句话就是对“昆明之属”族群全民信巫教的综合概括。初唐时期，洱海区域广泛流行巫教信仰。在巫教信仰过程中，白族先民的拜龙意识并未减弱，仍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发展。及至初唐开始，佛教经由不同路线、途径和方式开始传播于洱海区域。但佛教的传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佛教受到了来自原始巫教的强大势力的顽强抵制，直到南诏中期的劝丰祐时代（公元824—859年），佛教才经过演变和发展，逐渐成为南诏主体居民白蛮与王室的共同信仰。在佛教艰难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大量的佛典文学故事也随之传入。其中同时存在于印度佛教密宗、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体系中的龙王龙女故事亦随之传布于白族地区。其中龙司水、主降雨、有神通、善变化，甚至能变形为人，或常具人格化，思维及行动，有眷属家族，有精美别致的龙宫，拥有奇珍异宝，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等观念，都直接由印度密教或间接由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传入。<sup>①</sup> 尽管佛教在白族地区的传布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很多地区巫教势力根深蒂固，甚至有些地

<sup>①</sup> 印度的 Nāga，梵语意为“蛇”，汉译佛典中被转译为“龙”。印度密教中的 Nāga 崇拜传播到大理后，亦被转译为“龙”。详参郑筱筠《印度佛教对中国龙王龙女故事的影响》，博士论文，复旦大学，1997年。



区还存在巫佛两教并存的情况，但是佛典故事中文学性和趣味性较强的龙王龙女故事却迅速为广大白族人民接受，并开始影响和改造着白族固有的龙文化系统，甚至有些巫教系统的龙文化现象也在局部接受了佛教龙文化体系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本主崇拜作为佛教与原始巫教共同斗争的最终产物而出现时，它也在白族先民原始水神崇拜的核心意识层面及王权与神权象征的文化层面上接受和继承了历史传承下来的龙文化，并以其兼容性和开放性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接受、容纳和改造了佛教龙文化。由此，白族固有的龙文化受到佛教龙文化的冲击后，分裂为两个独立存在却又相互关联的龙文化群：未成为本主崇拜组成部分的龙崇拜文化群和成为本主崇拜重要组成部分的龙王崇拜文化群，亦即龙神崇拜群和龙本主崇拜群。这两大龙崇拜群同时作为白族龙文化的组成部分存在于白族地区，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却又独立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个性，并且未能最终融合在一起。兹具体论述如下：

作为非本主崇拜成员的龙神崇拜在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继续发展本民族固有的龙文化，同时也积极融摄、兼容着佛教龙文化的熏染。由于白族固有的龙文化（包括原生态型的龙文化和属于巫教内容的龙崇拜）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佛教龙文化难以成为主导，但却开始为白族固有龙文化容纳。这一龙神崇拜的悖论性特征表现为它的内容较为驳杂，有对固有的龙文化的改造，也有反映佛教（尤其是印度密教）与巫教的斗争，有的则直接表现为吸收佛教龙文化意识后，以本土龙文化为原型进行创作的；在情节设置上则表现为挪用佛典龙王龙女故事的部分情节或直接设置佛教龙文化物象于白族龙文化中。

首先，要强调的是白族龙文化始终是以原始的水神观念为核心意识发展嬗变的。如：围绕着治水这一题材，演变出斗龙型故事，如《小黄龙和大黑龙》故事中小黄龙与大黑龙之斗争，反映了白族先民企图依赖与人为善的水神——小黄龙制服与人为难的水神（大黑龙）的社会意识。及至佛教文化输入，佛典中生动有趣的龙王龙女故事广泛渗入到斗龙型故事中并演变为两类：一类故事是以佛教人物或崇佛人物为主角，以其制服龙（或水患）的行为来组织故事情节的。如《师摩矣锁龙》、《杨都师驯